

陳冠中

我這一代香港人

我這一代香港人

陳冠中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in

Oxford New York

Auckland Bangkok Buenos Aires Cape Town Chennai
Dar es Salaam Delhi Hong Kong Istanbul Karachi Kolkata
Kuala Lumpur Madrid Melbourne Mexico City Mumbai Nairobi
São Paulo Shanghai Taipei Tokyo Toronto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First published 2005
Second edition 2006, 2007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7 9 10 8 6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t the address below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book in any other binding or cover
and you must impose the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我這一代香港人

(增訂版)

陳冠中

ISBN 978-0-19-549569-0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份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目 錄

I

我這一代香港人

——成就與失誤	3
移動的邊界	26
香港作為方法	34

1. 混雜是美的：香港文化發展的附加法
2. 擱是我們的特色：再擁擠也只能在城裏
3. 香港還需要新的地標嗎？

香港作為方法

——都市神韻	42
雜種城市與世界主義	50

1. 雜種城市
2. 多文化主義
3. 雜種世界主義
4. 什麼是世界主義
5. 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
6. 反帝國主義的世界主義
7. 世界主義的民族主義

粵港澳創意文化共同體 74

兩岸三地一中文 83

城市建設與創意產業 90

II

坎普·垃圾·刻奇

——給受了過多人文教育的人 99

現在讓我們捧台北 135

較幽的徑 146

愛富族社交語文

——英文關鍵詞 151

上海超時尚夜店的誕生 176

在北京尋電影 184

演員還是重要的

——小城之春·生活秀 188

不藐視普通人的感情

——和你在一起 192

我愛你 196

英 雄 200

現在的大學生真能啃 204

III

墨索里尼的幽靈 211

民工就在你身邊 222

一個香港人在北京	
——新浪網新春感言	227
社會制度的六種謬誤	230
個人·制度·文化	234
獨自打保齡	238
廉政與善政	242
關於香港地區法治的二三事	246
不要小看一句話（淑世謎米）.....	250
社區維權的興起	254
消費者運動的濫觴	258
社會創業家	262
關懷與正義的辯論	266
動物的權利	270
1960年代的頭五年	274
技術哲學的轉向	278
走出負托邦	282
綠色資本主義	286
綠色資本主義	
——15年後的補記	297
顧左右而言他	
——歧路中國的絳樹兩歌	300

I

我這一代香港人

——成就與失誤

我是上世紀 1952 年在上海出生的，四歲到香港，小時候上學，祖籍欄填的是浙江鄞縣，即寧波。我在家裏跟父母說上海話其實是寧波話，跟傭人說番禹腔粵語，到上幼稚園則學到香港粵語。我把香港粵語當作母語，因為最流利，而且自信的認為發音是百份百準的，如果不準是別人不準，不是我不準。就這樣，身份認同的問題也解決了。

我後來才知道，我是屬於香港的「嬰兒潮」，指的是 1949 年後出生的一代。香港人口在二戰結束那年是五十萬，到 1953 年已達兩百五十萬，光 1949 年增加了近八十萬人。隨後十來年，出生人口也到了高峯，像舊式的可樂瓶一樣，開始還是窄窄的，後來就膨脹了。

可想而知我這代很多人對童年時期的貧窮還有些記憶，家長和家庭的目標，印在我們腦子裏的，似乎就是勤儉，安定下來，改善生活，賺錢，賺錢，賺錢。

我們的上一代當然也有一直在香港的，但很大的一羣是來自廣東的、來自上海和大陸其他地方的，是在認同大陸某個地域而不是香港的背景下走出來的。

南來的知識份子更有一種文化上的國族想像，逃至殖民邊城，不免有「花果飄零」之嘆。

然而，從我這代開始，變了，就是，中國大陸對我們來說只是一個帶點恐怖、大致上受隔離的陌生鄰區，而我們也沒有寄人籬下的感覺，沒有每天苦大仇深想着香港是個殖民地，我們只是平凡的長大着，把香港看作一個城市，我們的城市。

這裏我得及時聲明我是在發表對同代人的個人意見，並不是代表同代人說話，說不定有人一生出來就懂得愛國反殖。我在下文想說明的其中一點恰恰就是愛國和民主一樣，對我們來說都是後天慢慢建構出來的。

我們的中小學歷史教科書是不介紹中國二十世紀當代史的。儘管中文報紙上有報導大陸的消息，我這代在成長期往往在意識中是把當代中國大致排斥掉的。

我這代一個最大的共同平台，就是我們的中小學，不管是政府還是教會或私人辦的。唯一例外是「左派」學校的學生，在人數上是極少數。

我們的學校當時是怎樣的學校呢？是一條以考試為目標的生產線。我們這代人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考完試後就會把學過的內容給丟了，這對香港整代成功人士有很大的影響：他們可以很快很聰明地學很多東西，但轉變也很快，過後即丟，而且學什麼、做什

麼是無所謂的，只要按遊戲規則，把分數拿到。

在中學裏面，我覺得唯一不全是為了考試的學科，除了教會學校的聖經課，就是中文中史課。我們的中文老師可能也是我們唯一接觸到中國大傳統的渠道，關於中國文化，甚至做人德行，都可能是從中文課上獲得的。現在我這代中人，對文化歷史時政有些理想主義想法的人，很可能都是中文課的好學生，或讀過武俠小說，否則說不定連小小的種子都沒有了。

可惜中文課在香港英文學校裏是比較邊緣的東西，有些根本就不理這門課。

1964年，我這代進入青春期，那年，披頭士樂隊訪問香港。

我那比我大一歲的姊姊和同班同學去電影院看了十次披頭士的電影《一夜狂歡》。

我們跟父母搞了些代溝，稍留長了頭髮，穿牛仔褲，彈吉他。因為我們曾手拉手唱過英語反戰歌，我以為不用問大家都是接受平等及參與性的民主，我要到了1980年代中才覺悟到沒有必然關連。

1973年，香港股市在狂升後出現「股災」。

我這代的青春期，就由英美時髦文化開始，到全民上了投資一課後畢業。與同期同代大陸人太不一樣，我們可說是「什麼都沒有發生」的一代。

當然，中間經過1966和1967的兩次街頭抗爭插曲。第一次帶頭反天星小輪加價的是青年人，對未成

年的我們有點不甚了了的輕微吸引。第二次衝突大多了，是文革的溢界，逼着站在港英一邊的明智大多數和他們的子女，隨後的許多年對中國大陸更有戒心——把大陸視為他者，相對於「我們」香港。除此之外，以我觀察，六七年事件對我這代大多數人的心靈和知識結構並沒有留下顯著痕跡。

這時候登場的是香港隨後三十年的基調：繁榮與安定壓倒一切。

這時候，香港政府調整了管治手法，建公屋，倡廉政。

這時候我這一代也陸續進入人力市場。

連人口結構都偏幫我這一代：我們前面沒人。

就是說，嬰兒潮一代進入香港社會做事時，在許多膨脹中和冒升中的行業，他們往往是第一批受好教育的華人員工，直接領導是外國人或資本家。我們不愁找不到工作，我們晉升特別快，許多低下層家庭出身的子女憑教育一下子改變了自己的社會階層，我們之中不乏人三十來歲就當外企第二把手。

似乎不論家庭或學校、文化或社會，都恰好替我一代做了這樣的經濟導向的準備，去迎接隨後四分一世紀的香港經濟高速發展期。

我們這批人不知道自己的運氣好到什麼地步，其實並不是因為我們怎麼聰明，而是因為有一個歷史的大環境在後面成就着我們。香港是最早進入二戰後建

立的世界貿易體系的一個地區，在日本之後便輪到我們了，比台灣早，台灣還搞了一陣進口替代，我們一進就進去了，轉口、貿易、輕工業加工代工，享盡了二戰後長繁榮周期的先進者的便宜。另外，大陸的鎖國（卻沒有停止以低廉貨物如副食品供給香港）也為我們帶來意外的好處，這一切加起來，換來香港當時的優勢。我這批人開始以為自己有多厲害、多靈活、多有才華了。我們不管哪個行業都是很快就學會了，賺到了，認為自己了不起了，又轉去做更賺錢的。

我並不是說我們不曾用了力氣，我想強調的是：

這一代是名副其實的香港人，成功所在，也是我們現在的問題所在。香港的好與壞我們都要負上絕大責任。

我們是受過教育的一代，可訓練性高，能做點事，講點工作倫理，掌握了某些專業的局部遊戲規則，比周邊地區先富裕起來，卻以為自己特別能幹。

我們從小知道用最小的投資得最優化的回報，而回報的量化，在學校是分數，在社會是錢。這成了我們的習性。

在出道的1970和1980年代，我們在經濟上嘗到甜頭，這成了路徑依賴，導至我們的賺錢板斧、知識結構、國際觀都是局部的、選擇性的，還以為自己見多識廣。

我們整個成長期教育最終讓我們記住的就是那麼

一種教育：沒什麼原則性的考慮、理想的包袱、歷史的壓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偉很長遠的東西。這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的一種思想心態：我們自以為擅隨機應變，什麼都能學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時間內過關交貨，以求那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報。

我在香港拍過一部美國電影，美國的設計師要做一個佈景枱子，叫香港的道具師幫他做，他每天來問做好沒有，香港道具師都回答他，不要緊，到時一定會做好的，等到開拍那天，果然那張枱子及時被搬進來了，表面上看起來還是不錯，但仔細一看，枱子的後面是沒有油漆的，因為後面是拍不到的，而且只能放着不能碰，一碰就塌。美國的道具師不明白，為什麼我早就請你們做個枱子，要到最後一刻才交貨，並只有前沒後；香港的道具師也裝不明白，你要我們做個道具，不是及時交貨了嗎，而且是幾秒鐘鏡頭一晃就過去的那種，為什麼要做得太全呢，在鏡頭裏看效果是不錯的，況且不收貨的話也沒時間改了。這是我們的 can do 精神、港式精明和效率。

我這代這種心理，早在成長期就有了，到我們出道後更是主流價值，不是現在年輕人才這樣，現在年輕人都是我們這代教出來的。

說 1970 年代是「火紅的年代」、我這代是理想主義一代，喂，老鬼們，不要自我陶醉了。

正如太多我這代人自以為了不起，其實比不上我們的上一代，只是運氣比較好。同樣，火紅的一代也只是後來膨脹了的神話，嚴格來說，都是失敗者。

首先，火紅並不是我那代的主流特質，實際參與的人就算在大學裏也只是很小的一羣：我在1971年進香港大學，在我所住的宿舍裏前後三年百多名宿生中，我知道的參加過「保衛釣魚台」運動最大一次示威的才只有三個——有個別的宿舍比例確是較高。

當時大學生的左翼小圈子裏有兩派，一個是毛派，也叫「國粹派」；另外是更小的圈，是左派中對當時的毛和文革有批判的一派，叫「社會派」。在大學外，有幾個無政府主義者，和幾堆跟當時僅存的港澳老托派聯絡上的年輕激進派，這些圈子也很小，雖然戲劇效果較大。教育、教會和後起的社工界、法律界、新聞界也有個別關心公義的人士和組織。像我這樣鬆散參加過校園民主、民生(反加價、反貪污)、民族(中文成法定語文、保釣)等活動的人則稍多一點。港澳工委在香港的有組織「左派」(不包括親北京工會會員)人數當然又多一點。但總的來說在主流社會裏是少數，說起來遠不如1989年、2003年上街人數——那才是火紅的年份。

待四人幫倒台，不少毛派學生馬上進入商界，到美國銀行等商業機構做事，一點障礙都沒有。1979年改革開放後，他們又是第一批去大陸做生意的人。到

底是香港教育出來的精英。

可以看到，毛派的深層執著不是毛主義，而是國族，可提煉出來給今天的是愛國。其他零星異端左派當年的主張，也幸好沒有實現，然而他們的基本關注是公義，可滋養今天的民主訴求。這就是火紅一代的遺產。

火紅年代的影響很有限，所以在1980年代，民主和愛國都未竟全功。如果嬰兒潮一代人當時空羣而出要求民主如2003年的五十萬人上街，基本法都怕要改寫，事實是大部份我這代經濟動物根本沒有去爭取，而少數已成既得利益的同代人，竟有反對普選等普世價值的。同時，我這代人仍普遍保留了之前對大陸的畏和疑，而1989年的天安門鎮壓更嚴重拖慢了港人學習愛國的進程。

不在公共領域集體爭權益，只作私下安排，也是本代人特點：1980至1990年代中出現往加拿大和澳洲的移民潮。對部份南來的老一代是再出走，對嬰兒潮一代是留學以外第一次有規模的離散，大部份是因為九七要回歸而移民，故不是經濟移民，而是替家庭買一份政治風險保險。有部份的家庭，將太太和子女送去彼邦，丈夫仍在港工作，成「太空人」，因為香港的工作更能賺錢，兼想要兩個世界的最好。真正斷了香港後路者，他們的位置也很快為留港的原下屬補上。

許多成年人移民後的香港身份認同並沒有動搖，身在

彼邦心在港。對我這代來說，在亞洲金融風暴前，從財富和機會成本計算上，移民加澳應屬失利。眼見香港持續發達和大陸的變化，九七前後回流香港的也不少。當然也有決心溶入彼邦，選擇另一種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的。總的來說，移民潮勢頭雖強，最終只是移民個人和彼邦的新經驗，過後竟沒有在香港留下重大烙印，沒有妨礙過去二十年香港主流的發展，而九七效應更曾一度加強這主流：賺快錢。

一直以來，就香港大學來說，主流所嚮往的，除了當醫生外，是在香港政府裏當官。文官有兩種，政務官和行政官，都要大學資格；而那些所謂最精英的政務官，他們的英語要好，大概頭腦也要比較靈，這類官員總處於職位變動中，今年可能管經濟，明年說不定派去搞工務，換來換去，當久了自以為什麼都懂，其實是按既定規章制度程序辦事，換句話說只懂當官僚。說到底，他（她）們也只是香港教育出來的精英，我們又如何能對他們有着他們認知程度以上的期待？

到1970年代中，主流精英除了各種專業如律師、建築師、工程師、會計師、教師外，還多了一種選擇：進入商界，特別是外企。1973年港大社會科學院應屆畢業生就有幾十人同被數家美資銀行招攬。我們走進了香港的盛世——嬰兒潮代的鍍金年代。

我們帶着這樣的教育和價值觀，自然很適合去企